

# 告别解放与自由的神话

——论后现代政治的基本思想与精神

许丽萍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后现代政治对自现代性以来的解放政治基本持批判与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诉诸理性、主体、意义、进步、解放等“大叙事”、“元叙事”的解放政治,是导致整个现代政治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后现代政治诉诸一种与解放政治的宏观政治完全不同的“小叙事”、“游牧叙事”等微观政治,以期使人类走向希冀久远的理想之境。然而,这种极端的、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只能是导向政治虚无主义。

**[关键词]**后现代政治;解放政治;宏观政治;微观政治

---

## Farewell to the Mythology of Freedom and Emancipation: The Basic Thought and Spirit of Post-Modern Politics

Xu Li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t should be said that, basically, post-modern politics criticizes or negates the emancipation politics which started with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 and it thinks that this emancipation politics, which appeals to the "macro-narratives" or "meta-narratives", such as rationality, subjectivity, meanings, progress, liberation and so on, is the very reason to result in the errors of the whole modernity. Post-modern politics tries to resort to a kind of micro-politic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macro-politics, to guide human beings to the ideal land. Howev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kind of extreme and pure subjective solution certainly leads to the political nihilism in the end.

**Key words:** post-modern politics; emancipation politics; macro-politics; micro-politics

---

后现代政治图景并不是那么规整划一,各行各派的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但是,无论各个思想家呈现出怎样的精神气质和思想风貌,说到底,都是殊途同归,即他们都对现代性以来的解放政治的宏大政治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解放政治在捍卫主体自由与尊严的同时,又以一种

[收稿日期] 2008-04-1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福特基金资助项目(103000-T20601)

[作者简介] 许丽萍,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更隐蔽、更专断、更制度化的方式去抑制、甚至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解放政治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根本没有实现它当初的承诺。为此，后现代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种与解放政治完全不同的后现代微观政治范式，认为只有通过对个体的深情关切，通过倡导差异和多元，肯定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层面的作用，才能使人类走向希冀久远的理想之境。

## 一、别一种解放：从大叙事到小叙事

解放政治是一种宏观政治，无论它的叙事方式还是思维方式均属于现代理性的元叙事或大叙事方式，而后现代政治则是对这种元叙事的怀疑或不信任，利奥塔的有关思考很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利奥塔是后现代政治理论的第一人，也是后现代政治思想的精神领袖，他确立了后现代政治的基本思想与精神。后来的后现代政治理论家总体上还是在他的“星星之火”基础上的“燎原”。关于这些认识，可以说已是公认的了。“就关于后现代性的一般理论而言，他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主要倡导者之一。”<sup>[1]2</sup>“在各种思想派别和各种影响重大的辩论中，在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话题上，利奥塔的观点都得到了极为频繁的引证，这足以证明他的著述所扮演的关键角色。”<sup>[1]2</sup>若要对现代之后的政治思想有所领悟和思考的话，我们就必须依傍利奥塔<sup>[1]4</sup>。所以，把握利奥塔，是我们了解后现代政治思想的理论入口，也是我们从中窥见后现代政治镜像的最好视点。

早在现代性初期，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为了证明其自身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共同炮制出了一套哲学话语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这就是诉诸理性、真理、主体、意义等“元叙事”或“大叙事”。这套元叙事带来了两个保证：历史的进步和人的普遍解放，它也自然因此得到了拥戴。“叙事知识重新回到西方，为新权威的合法化带来了一种解决办法。”<sup>[2]63</sup>而作为在这套知识体系下产生出来的现代政治，也在这种进步与解放的元叙事的羽翼下获得了合法性。缘此，现代政治就被称为解放政治。

在利奥塔看来，解放政治的一切都诉求于这种元叙事。然而，这种元叙事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元叙事鼓噪“永恒真理”、“普遍解放”之类的宏大目标，它们虽然具有很强的诱惑性和迷醉性，但却只是启蒙炮制出来的“人间神话”，也因此不过是美丽的“陷阱”。现代人都在为这个铺满鲜花，充斥着芳香，拥有无限物质享受的诱人“陷阱”，付出惨痛的代价。

所幸的是，永恒真理、普遍解放、必然进步的元叙事方式，随着牛顿人类学的衰落而式微。人们渐渐从这场梦魇中觉醒过来。因此，利奥塔认为，今天已到了对元叙事普遍怀疑之时<sup>[2]2</sup>。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了后现代之时。因为他把后现代直接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后现代政治就是要对长期诉诸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等解放政治的这种大叙事的哲学话语、元话语进行革命性的批判，直至它全面消解<sup>[2]1-2</sup>。

为此，利奥塔就开始竭力诋毁以理性、真理、进步、解放为名的元叙事，反对任何以普遍性、总体性为原则的正义理论，对现代政治的对象、方法、标准、目的、意义进行猛烈攻击，进而提出一种植根于微观的多元正义理论，并试图倡导一种以自我、身份、情感、价值、认同、话语、言说等个体化、微观和非理性化为特征的政治。

如果说，解放政治是诉诸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普遍主义，追求确定性、同质性，坚信理性、真理、意义、目的、进步、解放等“元叙事”话语，那么，后现代政治则是反对基础主义、普遍主义、总体性等“元叙事”，倡导差异性、多元化、不确定性、偶然、局部化等“小叙事”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关注微小的、局部的目标，突出差异性、即时性、易变性和不确定性，追求误构，通过误构来确保多样性、突变性、易逝性。这样，随着小叙事的“微观政治”的来临，就意味着先前作为大叙事的解放政治之合法性的瓦解。同时，“大写的人”也随着普遍解放的失效而消失。从此以后，人只能

有一种书写方式,那便是小写的人。

这种求助“小叙事”的“微观政治”,实际就是一种多元反抗的政治。它依然以解放为目标,但首先需要把解放从神话中解放出来。消除了普遍解放的迷梦后,人们才会以多元的方式在微观的领域中获得真正的解放。按利奥塔对政治的理解,人要达到真正的解放,不能诉诸同一、宏观,而应从差异、微观中寻找解救的方法。他坚信,凭借这些微观、多元抵抗,一定能颠覆现代性的统治关系。也就是说,利奥塔把那些曾被现代政治所忽视的微观和边缘力量提到了前台,认定它们将在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此,“异教主义”就成了利奥塔用来表达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异教主义”主张“异端”,反对中心、本质、基础、特权和正统。而这些恰好反映了他对中心、基础、本质、普遍、必然、同质的反叛和对差异、多元、突变的积极颂扬的意愿。

应该说,利奥塔对现行政治的思考是深刻的,批判也是大胆的。他用一种激进方式对解放政治进行全面颠覆与摧毁,把政治描绘成这样一番图景:“在一种政治的意义上,这种意义不是制度的(议会、选举、政党……),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与一种过时的意义相近——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就是意味着还没有做出决定,然而又总是,又必然总是将要做出决定。”<sup>[1]6</sup>于是,他一反政治就是讲国家、阶级、政党、议会及其政治制度等议题的常态,也反对政治就意味着作出终极决策和终极判断的提法<sup>[1]6</sup>。对他而言,政治应该是指日常生活实践的话语方式、思想方式、价值方式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选择和行动方式,还有对确定性的积极解构和对可能性的无限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认为,前卫艺术是对政治意蕴与特性的极好表达。于是,他把政治的意蕴与特性通过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展露出来。可想而知,在这种情景中,解放政治若不一笔勾销,也没有存在的实际意义。

据此,我们认为,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政治思想使我们明白了启蒙理性“元叙事”的知识话语的真相,发现了解放政治潜伏的各种问题,走出了总体性、绝对性、确定性、普遍性、进步的“历史哲学”的迷雾,看到了一个差异、多元的全新政治图式。

然而,后现代政治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的理论存在着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后现代政治反对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认为它是不可能的。然而,后现代政治在沿着反总体性、普遍性的路径前行时,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泥潭中。如在对待正义问题上,后现代政治理论家主张多元,反对普遍原则和标准。在他们看来,只存在多样化的正义,不存在普遍一致的正义原则。于是乎,他们自己就把多样性的正义原则泛化为一种普遍的原则,最终使自己不由自主地滑入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沼泽中。而且在坚持正义多元主义的原则时,后现代政治理论家最后把正义看成是不可定义、没有标准、没有原则、什么都行的东西,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没有了界线。这种绝对相对主义的正义立场,最终必然以丧失真正的正义为代价。

由此可见,后现代政治理论一方面的确为现代政治开辟了一种新思维,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和批判维度,但另一方面,它的政治主张不仅不能为人类进入一个更公正、更和平的社会开辟航道,而且还为政治虚无主义打开了阀门。关于这一点,利奥塔似乎有所察觉,所以,这迫使他最后无奈地走向康德。应该说,利奥塔的无奈是整个后现代政治理论家集体性的尴尬。

## 二、别一种自由:从解放政治到游牧政治

解放政治极力提倡自由这一观念,强调从外在的、制度的层面来保障人的自由权力,保障自由的实现,而在后现代政治家看来,这种自由很可能是一种压制的手段,并因此主张以“临界自由”、“生成自由”取而代之,这在德勒兹的思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一位对现代性的解放政治进行集中批判且极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后现代政治思想代言人,德勒兹的地位和影响恐怕是他人难以企及的。福柯曾这样说道:“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被认为是德勒兹的世纪。”<sup>[3]424</sup>

德勒兹同样把政治分为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宏观政治主要是指那些把国家、政党、议会、阶级、民族、制度等当做政治活动对象的政治；微观政治则指那些把身体、情感、性、欲望等微观元素作为关切对象的政治。在德勒兹这里，解放政治很自然地被归为宏观政治的范畴。解放政治是一种克分子式的政治。克分子式的政治就是指一种外延的、可分的、可规整划一的、可组织化的、可同一化的、可整合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就是通过编码系统或辖域化的国家机器进行治理，强调从外在和制度的层面来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权力，然而在德勒兹看来，这不仅不是自由，反而是自由的锁链。因为真正的自由是一种“临界自由”、“生成自由”，是主体在经过解码或解辖域化之后，让欲望逃脱层层压抑的重围，达到一种无遮拦的放纵状态的自由。因此，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由，它直接关注个体情感的体验与感受，强调个体的意志自由。这就是说，在德勒兹眼里，以自由为指归的解放政治与自由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实际是一种压制人的机器。

既然解放政治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这个时代又是注定不会发生革命的时代，因此，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就势必成为解决问题仅存的视域。缘此，德勒兹希冀借助身体、情感、欲望等微观要素和多元抵抗的方式，来对国家的编码或辖域化进行解码或解辖域化，以求人的自由。据此，他提倡一种游牧式的、差异性的欲望政治——游牧政治。游牧政治主张一切都是偶然、易变和转瞬即逝的，坚信事物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中，创造就是意义，通过突破一切编码和辖域的重围，让生命之花自由绽放。

游牧政治思想是德勒兹政治思想的核心，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此种理论的尝试与建构。他用“游牧”来隐喻自己对自由无限追求的政治蕴含。我们知道，游牧民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他们生活在国家机器的管辖之外，身处社会边缘，没有物质和安全上的保障。而且，他们的行程没有固定的路线。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活动，而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内行动。这个空间是非条纹状的，没有墙，完全敞开的，是一个平滑空间。平滑空间是指富含多样性的一种异质空间，是块茎和碎片状的，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流动状态。在这个平滑空间里，生命不受任何限制，处于绝对自由的情状。他认为：“决定游牧民的根本要素就是占据和拥有一个平滑空间。也正是这一要素，决定了游牧民的性质特征。”<sup>[5]196</sup>游牧民的这种生活的任意性特征显然与他追求自由的政治旨趣相吻合。

不仅如此，德勒兹还用游牧民来隐喻战争机器。战争机器是指那些外在于国家并与国家相敌对的社会装置。战争机器表征着对捕获和辖域国家的反抗。从表面看来，战争机器旨在战争，但是战争机器的根本特征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占据、充斥时空或创造新时空的方式。德勒兹用游牧民自由任意的生活方式，来隐喻一种与以同一性、整体性的国家主义、官僚体制及其各种集团组织为依托的解放政治相对立的新的政治图式。而“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给它统治的空间加上条纹，或把平滑空间用作交流工具，使其服务于条纹空间”<sup>[5]323</sup>。于是，国家“不仅要征服游牧生活方式，而且要控制移民，更普遍地说，是要建立控制整个‘外部’，控制横亘全世界的所有流动的一个权力地带”<sup>[5]323</sup>。如果说，国家意味着主权，其主要功能在于对各种流进行捕获和辖域，那么，战争机器就是要想方设法逃逸各种形式的国家辖域和捕获。“战争机器把国家、城市、国家和城市现象看做敌人，把消灭它们作为目标。”<sup>[5]367</sup>为此，国家想方设法地去消灭战争机器，控制、征服游牧民，企图操控一切流动的权力地带。而且，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国家机器，使游牧民始终处在被控制、被征服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指出，游牧民没有历史只有地理。游牧民的历史被国家这个强大的“利维坦”所吞噬了。一切历史都只是国家的历史。但即便如此，游牧民——战争机器，也义无反顾地与强大的国家机器作最后一搏，试图逃脱国家机器的重围，而任自己自由地游荡<sup>[6]410</sup>。

概而论之，游牧政治是一种与正统的解放政治相对的政治。游牧政治思想旨在通过倡导差异、

多元和解辖域化,肯定生命、欲望和情感等内生性力量,讴歌生命的生生不息和创造的万象情状,希冀以游牧式的抗争方式来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全面颠覆。“按照这种颠覆,存在被说成生成,同一被说成差异,一被说成多。作为一个原则而存在的同一,它不再是第一,而是作为一个次要原则,一个生成原则,它将绕着差异而运行。这将是一场哥白尼式性质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为差异开辟成就自我可能性的通道。”<sup>[7]40-41</sup>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就是以微观式的游牧政治来反抗宏观式的解放政治,并以期实现自由的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尝试。

德勒兹反对解放政治,倡导游牧政治,除了有十足的理论层面的原因外,也像其他后现代政治理论家那样,更多的可能还是被现实所激发。如福柯把18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称之为惩戒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体始终被禁锢在家庭、学校、军营、工厂、医院、监狱等系统中,无法逃逸。而德勒兹则把今天的社会称之为被控制论和电脑控制的社会<sup>[4]199</sup>。这种社会看似是把个体置于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情境下,但其实质是一种更为普遍化、同一化的严酷禁锢。在德勒兹看来,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较以往社会更加进步与文明,尽管资本主义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从不同程度解除了传统、自然和上帝的束缚,但是,资本主义在解除各种旧的枷锁与束缚的同时,又利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重新编制了各种各样的编码系统。这种新的编码系统比以往一切社会的编码更严密、更精细,从而成为套在人身上的一具更为沉重的枷锁。因此,德勒兹声称,今天的政治需要采取一种微观的方式——这就是他所说的游牧的和欲望的政治。

那么,这些一直被隔离在解放政治之外,且不被正统政治所承认的微观元素,如何成为自由的力量并登上政治的核心舞台呢?对此,德勒兹作出这样的回答:其实游牧和欲望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它们具有颠覆现存一切社会形态的可能。他自己就一直把游牧方式与欲望看做是社会基础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它们是创造一切社会现实的动力。比如,在他看来,社会经济就直接根源于人的生理和人性欲望。总之,他坚信,只有通过游牧的、欲望式的政治解救方式,才能够真正地对抗来自科层制和日常生活规制等无所不在的压迫,最终实现人的自由。

此外,后现代政治理论家反对正统的解放政治不仅反映在他们文本的内容中,而且还体现在文本的写作方式和措辞上。像利奥塔一样,德勒兹也特别青睐前卫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这种标新立异甚至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反对正统,反叛现实政治。而且他还运用那些不同寻常、别出心裁的概念,如“欲望”、“块茎”、“游牧思维”、“战争机器”、“解辖域化”、“力本论”(dynamism)等,来表达与解放政治话语截然不同的路向。他的《千高原》就是以前卫的后现代表现手法书写而成的,有人把它称为“块茎式文体文本”。由此也可看出这些后现代政治理论家反现代性的解放政治的决心和理论勇气。

### 三、结语:矫枉过正的后现代政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以利奥塔和德勒兹为首的这些后现代政治理论家们的共同特征是:反对理性、真理、主体、意义,批判同一性、总体性,主张差异、多元、偶然、易变,重视身体、欲望、生命,并把后者看成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之流,具有颠覆世界的无穷威力。也就是说,他们本能地厌恶任何理性、真理、同质、普遍的东西,认为这是一种暴政。于是他们与解放政治发生了最彻底的决裂,把生活方式、话语、身体、欲望、生命、情感看做是政治的核心,并以此来取代阶级、国家、议会、制度等以往政治的核心议题。这些政治思想家们坚信,只有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让生命之流自由涌动,人的自由和解放才得以可能。

我们认为,这些后现代政治理论家们的确看到了解放政治的问题,即解放政治在追求人的自由

与解放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压迫与统治机制。通过对现代性问题的全方位分析，这些理论家多角度地揭示了解放政治的单纯内涵，并因此使现代社会的控制策略及其虚伪性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在他们眼里，现代性意义的自由、解放只不过是新的控制手段而已<sup>[8]227</sup>。据此，他们希冀通过微观力量来实现自由与解放，这无疑很有意义和启发性。此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政治的这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指出，这些后现代政治家们对解放政治的某些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如他们试图用微观政治之道来替代宏观的解放政治之道，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说是低估甚至无视解放政治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而且，诚如上文所指出的，他们自身的理论也存在许多逻辑上不能自洽之处，其缺陷显而易见。不仅如此，虽说这些后现代政治理论家有一定的政治主张，也有相应的理论建构，但这些理论是建构在虚无主义的泥潭上，因为他们把本应作为建构的基石彻底砸烂，而致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由此可说，这些后现代政治理论家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就不具有治疗意义。更何况，其大多数理论仅停留于批判、解构的层面，且在解构中不由自主地坠入虚无主义的深坑。

在我们看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实践层面，强调生命、情感、欲望、不确定性、差异性、多元性与寻求理性、真理、确定性、普遍性、同质化双向并重是必要的、有益的，偏废任何一方都可能带来不良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客观地讲，强调理性、真理、普遍性并没有错，现实生活的确需要理性、真理、普遍性的指导。这就意味着，问题不在于理性、真理、普遍性本身，而在于我们怎么理解和在何种意义上强调和贯彻理性、真理、普遍性。因为理性、真理、普遍性是达成共识、合作、有序与理解的基础。社会如果失去了对理性、真理、总体性的有效把握，缺乏具有普遍约束性的法律，那么，权利、自由、社会政治民主、秩序将无从谈起。而且，生命、情感、差异、多元、非确定性本身也只有在关系性、系统化的场景中诉诸理性，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这就是说，把理性、真理、确定性、普遍性推向极端，固然是可怕的，但完全置理性、真理、确定性、普遍性于不顾，则更具危险性。而后现代政治总体上对理性、真理、确定性、普遍性采取彻底的拒斥态度。因此，对后现代政治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我们不予苟同。我们认为，后现代政治这种消解一切、否定一切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境地。也就是说，后现代政治在反现代性的解放政治过程中走得确实过远了，其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的后现代理论家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有了后现代政治由早期的激进型向后来的温和型再到今天的建设型的转向。这说明，作为一种追求异乎寻常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为目标的后现代政治理论流派不可能是封闭的、静态的和始终如一的铁板一块，而是流动、发展和多元的理论形态。如建设型的后现代政治家已不像早期的那些后现代政治家们走得那么极端。但无论如何，后现代政治具有家族相似性，这就是对诉诸“大叙事”、“元叙事”的解放政治的普遍不满与拒斥，和对“小叙事”的微观政治不遗余力的追求，以及表现出来的鲜明的否定性精神特质。这种否定性立场，决定了它很难去正面肯定或者真正追求到一些东西，以至于不仅起不到任何积极的疗效，而且还可能带有破坏性。事实上，这种无理由的否定性背后暴露出的是其内在的无力，实际也是对失望和绝望的一种无奈表达。这种消极反抗注定了死亡将成为后现代政治的宿命。

因此，诚如上文所言，对这样的多元化理论形态进行任何一种概括性的论述都是一种内聚风险的行动。也就是说，我们所归纳的后现代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一定会与个别理论家的理论发生偏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后现代政治理论总体性特征的概括和对其内在精神的把握。或许，这本身就恰好说明理论概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参考文献]

- [1] [英]詹姆士·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赵雄峰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James Williams, *Jean-Francois Lyotard*, trans. by Yao Dazhi & Zhao Xiongfeng,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2]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Che Jinsh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3]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Wang Min'an, Chen Yongguo & Ma Hailiang(eds.), *The Faces of Foucault*,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1.]
- [4]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Gilles Deleuze, *Pourparler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trans. by Liu Hanq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 [5] 陈永国编:《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永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Chen Yongguo (ed.), *Nomad Thinking: A Reader of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trans. by Chen Yongguo,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6]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7]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8] 杨大春:《身体 语言 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Yang Dachun, *Body, Language and Others: Three Main Themes of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本刊讯:** 2008年12月29日,由浙江大学、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战略人力资源与创业管理国际会议”暨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年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英、法、中等国的五十多位战略人力资源和创业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就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进展、组织变革与发展、应用心理与组织行为、创业管理与行为科学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分析了目前全球经济危机情境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本次战略人力资源与创业管理会议是2008年行将结束前该领域的一次研究盛会,会议总结了我国学者在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新进展,并在与海内外知名学者的交流中建立了国际性的合作研究平台,以促进创业管理与不同管理学科的融合和知识的传播,进一步扩大我校在上述领域的影响力。